

# 中國政治總覽

張炳良著



(編者按：本文為張炳良先生應香港瑪利諾會士之邀，於今年初在赤柱會院所發表之演講。)

多謝各位邀請我來談一談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。大概各位都知道，我並非政治新聞從業員，沒有鍥而不捨地緊盯著每日的中國新聞；我也算不上是「中國觀察家」。因此，我在這裡不打算也恐怕不能夠，與各位談國內最近的政治衝突及爭論，或目前黨政領導層內的對立等問題。

以下我要和各位談的，是過往十多年間中國政治發展的趨勢，及一些我認為在觀察中國政治時應注意的要點。我的評論主要是對近幾年國內的事件及轉變，特別是針對過往十年的「改革」及「開放」政策，作一全面的分析。因此之故，我的講話可能變得「

見林不見樹」，希望各位能容許我在這樣的限制下講話。

首先，我想談一談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以來，中國政治的基本體制。在中國，政府體制是完全按照馬列主義而制訂的，全力於社會主義的建設。

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看法，隨著資本主義架構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倒台，仍會出現一種政治秩序，即無產階級專政，以確保資本主義社會能夠過渡而成為共產主義社會。

這種革命後社經轉形的階段，即在社會主義時期，「無產階級將運用其政治上的優越性，以奪取所有資產階級的資產，把所有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的掌握中，即無產階級組織起來的經濟階級手中；以求儘快增加總體的生產力。」（《共產黨宣言》）因此，新的國家，或稱為無產階級專政，將負責（一）資源的運用；（二）集中生產力；（三）拓展經濟。這一切都是為了提高社會的生產力及財富，以求早日過渡到更高層次的共產主義；屆時，由於達致了更高的生產力水平及具備充裕的物質財富，因此人民可以「各取所需」，而不用按照「資產階級法權」分配。由於消除了社會階級的分野及矛盾，國家能夠完全消滅生產過程中的剝削關係，之後它便可逐漸「消亡」。

這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邏輯及共產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概念，也就是社會主義政權植根所在的意識形態。蘇聯成了如何建立共產主義國家的典範。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，採用了史太林的模式，按照這個模式，共產黨成了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階層的先鋒，致力於保護及發展社會主義制度，因此必須成為各個社會組織及勞動階層中的核心領導組織。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實際上黨在各個層次

的社會生活中，控制了一切社會及政治生活。不過，有人認為在消除壓迫者階級之後，無產階級應代表著整個社會的利益。因此，本質上無產主義國家就是「人民」的國家，沒有像革命前的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存在與人民的割離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，由於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奪取政權，實有賴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支持，因此毛澤東把中國的政體稱為「人民民主專政」，作為到達無產階級專政之前的過渡階段。不過，到了一九五六年，中國政局開始左傾，中國共產黨宣稱在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，全面實行無產階級專政。

出於五十年代初期抄襲蘇聯模式，也出於傳統中國政治文化，並由於得到馬列主義作為思想上的支援，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共產政權大體上是高度中央集權的，所有權力都集中到以黨領導為核心的中央去。按照黨的「一元化領導」原則，一切國家機關、軍隊、經濟體系、群眾組織、工會組織以及文化活動等等，切受到黨組織的嚴格控制及影響。經濟是國家中央規劃的。法律只是黨章及政策的附屬。解決衝突及紛爭的地方是黨部而非法律機關。

不過，這些變化並沒有帶來一個一致及和平的社會。中國社會非但並未消除衝突及矛盾，且充滿各式各樣的社會不和。也許，這可算來得很自然，就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，在國內的衝突及國外的壓迫中，謀求擺脫貧困的局面及發展經濟。由於計劃經濟的失敗，加上不時出現經濟企劃上的失誤，也加重了「社會主義制度」內的矛盾。這些矛盾及衝突，牽涉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分歧時，構成了在六十及七十年代主宰中

國的政治上的派系鬥爭。隨著統治高層內部衝突的惡化，及社會上政治的制度化崩潰，派系鬥爭也愈演愈烈。社會主義國家自信是全民一體化，事實上否定社會上能有任何矛盾及不同的觀點存在。儘管在一九五七年，毛澤東強調必須謹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，仍不忘提出這些矛盾本質上不是階級對立。社會內的利益衝突及權勢的爭逐均受到官方的鎮壓，所有衝突都視為革命路線與反革命路線之間的鬥爭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階級鬥爭。

共產主義中國及其附屬社會組織本質上是斷然排斥任何自主的組織，否則將威脅到其政權。因此，產生了一個極權的經濟及社會集體，而在政治上，這些集體完全是由上而下支配的。由於政治體制妨礙了在社會中層（即政府與人民之間）發展自主組織，黨變成了直接與民眾對立，而黨也試圖透過國家所認可的，不自主的組織，如工會等，去影響、吸納、推動民眾運動。

黨國與社會力量的直接對抗，亦即是利益衝突及權力分配的敵對，最後歸結於一個要點——黨中央。在黨內解決紛爭，必須使用有力的政治工具，因此黨的路線備受重視。另一方面，由於黨國體系完全決定了人民的福祉，官僚架構所制訂的經濟計劃，不單是國家在發展社會主義路向上的藍圖，簡直是直接支配社會群體的價值觀及物質安排。結果，黨成為了社會矛盾的核心。

革命後直至七十年代末期，社會上一直充滿著社會及政治動盪。按社會學角度去解釋，這是植根於為發展社會主義而選定的特有社會組織形式。

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，事情才開始有所改變，共產黨重返鄧小平領導下的務實路線。鄧小平作出的改變，與其說是改革創新，

倒不如說是當時形勢逼出來的。換句話說，對於文革所留下來的爛攤子，中國領導層除了改革之外，別無其他途徑可走。

毫無疑問，文革為中國帶來鉅大的破壞，並對中國社會造成難以估計的混亂。但從歷史的角度看，文革的創傷引領人們去反省社會主義體制的問題。文革促使中國共產主義面對一個鉅大的危機，按我個人的看法，這是一個合法性的危機。文革之後的中國是處於深遽的混亂及前景不明之中。人們開始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，並質疑黨的領導能力。有些人甚至完全對前景表示悲觀。因此，這合法性的危機同時是共產主義及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危機。

在出現合法性危機之後，政府能做的途徑只有兩條，一是吸納群眾以增強支持力；一是付出更多的實惠與服務。也就是話，政府要就是促進政治改革，以容許更多的群眾參與，要就是改善經濟方面的表現，以確保得到受統治階層的接受。

按這理論，可以說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，是從吸納和付出兩方面同時著手解決合法性危機問題的。它首先推行經濟改革，以期一朝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。黨的威信在文革期間受到不少損害，再也不能單靠高喊政治口號及政治運動來鼓動人民的積極性，只有靠物質利益才可以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。引進開放型的經濟，減少國家的控制及增加私人參與及企業自主，不但表示一無成就的計劃經濟要退位讓賢，也特意地撤除對經濟活動的教條限制，以解放生產力，加速產品的供應量。黨也明白到本身力量的有限，因此全力支持經濟自由化，以減輕黨的負擔。

從吸納的角度看，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局部解決了合法性危機的問題。過去，黨的

威望是不容懷疑的。黨就是國家的解放者，是革命的先鋒。在七十年代末期，黨與民眾之間的信任鴻溝卻愈來愈闊，黨原應包容人民的利益及期望。由於黨方沒法再維持其意識形態的超然地位及道德上的領導地位，唯一能確保其政治支持的方法就是開放政治體制，容許更多人參與，並使整個體制更具代表性。重新恢復全國人大及政協的功能，加上提名及選舉程序的改革，是政治自由化的一些具體措施。不過，政治改革的更重要環節是權力下放，黨政分開，以及重新劃定國家與社會的關係。

中央權力下放是經濟改革所必然的後果之一，企業得以免受黨及國家的直接控制，有更大的生產及管理自主權。不但企業方面得到更大的決策權，省級及地方政府也得到更大的權力。經濟自由化的口號是建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，逐漸導向一個多元化的經濟結構，多元化的生產、多元化的擁有權、多元化的分配方式以至多元化的管理。這樣一來，加快了社會的多元發展。社會出現了更趨向利益本位，各有不同的利益關係，與從前由黨所代表的全體民眾的利益觀念有所不同。在這情況下，黨愈來愈難以維持其超然地位，它有需要避免成為衝突的核心，或站於高位成為衝突的訟裁者。黨政分開，是把黨的角色變得更加切合身份容易處理，好能適應外在改變了的環境。從現時起，黨只負責領導政治上的事務，對於國家及企業的事情，不會直接參預。黨的任務是確保國家的權力依然追隨黨的路線，黨的路線是全國的最高利益。黨繼續控制國家的大方向，儘管這種控制必須透過一些合法的憲制工具及程序來進行。黨政分開的一個結果是，重新設立了國家的權力體系，如全國人大及地方上

的人民代表會議，及國務院等，作為一個相對地自主的抗衡力量，並在必須時約束黨的權限。

重新審視現時的政治境況，不但發覺黨的權力及角色受到重新劃分，且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互權力關係亦起了變化。目前大勢所趨，是把過往社會主義者奉為正統的「大政府，小社會」的情況倒轉過來。隨著經濟不斷商品化，回應經濟利益的需要，主要是透過市場實現。政府的角色會退居而為監察政治秩序及制訂必須的法例，以確保市場健康地運作。

與上述政治改革同時，中國也出現了管理架構改革及組織上的改革。假如這些改革成功的話，可以建立起完善的幹部甄選及升遷的制度，量才而用，並更合乎法治的精神。國家將在適當的時候，推行公務員制度，效法西方民主國家的專業公務員的形式。

上述所談的改革，大部份仍在構想的階段，有待觀察其是否可以落實執行，以及在執行時會否出現其他問題。毫無疑問，任何改變或改革當中，都會有贏家和輸家。因此不可以企求改革會全不遇上任何懷疑或反對，蓄意破壞及歪曲。經濟改革事實上已碰上了釘子，人們在未能享受經濟持續成長所帶來的利益之前，先要面對不斷的通貨膨脹及日變惡化的貪污情況。政治改革的道路也絕不會是一條坦途。

最後，我在這裡所要指出的，是在目前共產主義中國的合法性危機中，這些改革實有深厚的社會需要。這一系列的改革可能不會完全成功，我們現時無須過份悲觀，因為假若危機持續的話，政治體制本身終必會找出方法，重新調和這種不平衡，而改變也只是時日的問題而已。(完)



張戾天著  
林瑞琪譯

## 認識中國宗教傳統

最近筆者參加了一次探討正統的中國宗教的研討會，與會的講者以亞洲問題專家為主，但大部份都不是中國人。整個研討會給我的印象是，儘管中國宗教在多個世紀以來，一直備受注意及爭論，但對現代學者而言，它仍是十分神秘的事物。與會者的意見交流及紛陳闡釋，更加肯定了我心底裡的看法：中西方的理解方式上，仍存在著鉅大的鴻溝。西方哲學的特質是以二元論為主，環繞在現實世界和理念世界兩方面的探究上。大會並未探討中國宗教在過往及現今的實情，反而在討論中國宗教應是怎麼樣。結果，研討會變成了導修課，竟教導中國人怎樣才算是真正的中國化，及如何實行。

中國文化在多方面均有傑出表現。中國文化的綿亘而悠久的歷史，不但保護了傳統的生活方式，更賦予中國人強烈的文化認同感。這種特性就是中國文明的核心。中國文化的綿亘及認同所產生的思想，就是深信他們的生活、所作所為，以及整個存在，都合乎上天的意旨。這說明了何以中國在其悠久